

《黑暗物质》三部曲中青少年的伦理选择与身份重构

On Adolescents' Ethical Choices and Identity Reconstruction in *His Dark Materials* Trilogy

张生珍 (Zhang Shengzhen)

内容摘要：后现代主义的不确定性特质带来了道德模糊性和道德相对主义，使得个体选择缺乏理性主义约束，导致个体选择的过度自由，个体成为了“飘浮不定”的责任主体。个体需要通过自律实现自我选择，进而完成自身的道德建构。后现代伦理强调在与他者的相互关系中进行选择，承担对他人的责任以实现正确的伦理选择，并借此修复道德契约，重建社会共同体。这一伦理学思想同样深入儿童文学创作，帮助儿童读者理解并习得如何依靠内在自我在利己与利他之间做出选择。《黑暗物质》三部曲中的儿童女主人公莱拉通过不断的试错和选择，最终学会放弃以亲缘关系为依据的伦理标准，做出以承担他者道德责任为出发点的伦理选择。在一系列的选择过程中，莱拉发挥自身能动性，不仅以自身行动拯救世界，更是将传承利他主义精神为己任，建设天堂共和国，成为社会道德秩序的恢复者和重建者。

关键词：后现代伦理；伦理困境；伦理选择；共同体；身份建构

作者简介：张生珍，北京语言大学英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外国儿童文学和文化、英美文学等。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世界儿童文学百科全书》翻译及儿童文学批评史研究”【项目批号：19ZDA297】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On Adolescents' Ethical Choices and Identity Reconstruction in *His Dark Materials* Trilogy

Abstract: The indeterminacy of postmodernism brings about moral fuzziness and moral relativism, which leads to the lack of restraint of rationalism in individual choice, resulting in excessive freedom of individual choice and the “floating” state of individuals. Individuals need to achieve self-choice through self-discipline, and then complete their own moral construction. Postmodern ethics emphasizes the choice in the relationship with others, the responsibility for others to realize the correct ethical choice, and thus repair the moral contract and rebuild the social community. This ethical thought is also deeply embedded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helping child readers to understand and learn how to rely on their inner selves to

make choices between egoism and altruism. Through trial and error, Laila, the child heroine in *His Dark Materials* Trilogy, finally learns to abandon the kinship-based ethical standards and make ethical choices out of her moral responsibility for others. During a series of choices, Laila exerts her own initiative, not only to save the world with her own actions, but also to inherit the spirit of altruism as her duty, to build the Republic of Heaven, and to become the restorer and reconstructor of social moral order.

Keywords: Postmodern ethics; ethical dilemma; ethical choice; community; identity construction

Author: Zhang Shengzhen is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English Studies,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Her areas of research include world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culture, British literature,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zhangshengzhen@blcu.edu.cn).

菲利普·普尔曼 (Philip Pullman) 的《黑暗物质》(*His Dark Materials*, 1995-2000) 三部曲因其与神话、文化、量子物理、宗教等话题间形成的复杂对话而备受关注, 研究者们多将其视为儿童文学复杂化的重要标志。大卫·古德勒姆 (David Gooderham) 等批评家关注到普尔曼对基督教道德话语体系的批判¹, 劳拉·彼得斯 (Laura Peters) 等人则审视文本呈现的政治话语, 指出了文本的后殖民轨迹, 其他批评文章则讨论了性别政治等问题²。对《黑暗物质》三部曲的研究虽呈多元化趋势, 却鲜有研究者关注到作品中体现出的伦理关系。《黑暗物质》三部曲中神话、量子物理、宗教、文化、生态环境等问题的交错与混合, 均关涉到最为基本的伦理问题。在面对这些复杂境遇时, 未成年人该依照何种伦理准则行动和抉择, 正是普尔曼等儿童文学创作者深思的重要议题。

本文借助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和方法, 细致分析《黑暗物质》三部曲中在成人缺席的情况下, 两位青少年主人公莱拉与威尔在面临诸如死亡、真理、友谊和战争等问题时, 如何依靠他们的自由意志, 以及从文化环境中习得的道德原则, 做出利他的伦理选择; 另一方面, 通过审视普尔曼对青少年身份重构的图景来考察青少年身份的转变, 青少年不再一味被动接受成人制定的伦理标准, 而是在面对困难与挑战时转变为具有主体性、对事情拥有自主判断力、掌握伦理选择权力的引领者。

1 参见 David Gooderham, "Fantasizing It as It is: Religious Language in Philip Pullman's Trilogy *His Dark Materials*," *Children's Literature* 31 (2003): 155-175.

2 参见 Laues Peters, "Revisiting the Colonial: Victorian Orphans and Postcolonial Perspectives,"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Philip Pullman's His Dark Materials*, edited by Steven Barfield and Katharine Cox, North Carolina: McFarland & Company, Inc., 2011, 93-110.

一、青少年面临的后现代伦理困境

20 世纪下半叶，西方社会演变出以后现代主义理论为先导的新思想。20 世纪 70、80 年代，西方语境中对现代性的反思成为潮流，伴之消费社会、后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的到来，西方社会的后现代性特征日益凸显。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通过对现代性与大屠杀关系的阐释，反思了现代性以理性和科学为指导，不断追寻人类进步所导致的伦理危机：“理性地保护自己的生存要求对他人的毁灭无动于衷。这种理性让受害者相互敌对，湮灭了他们共同的人性”（《现代性与大屠杀》265）。这样的后现代主义论断中包含着对伦理问题的重新认识，“正是大屠杀让我相信，不合逻辑的不见得就一定是错的”（《现代性与大屠杀》266）。在碎片化的后现代生活中，过往较为稳定的道德规范已发不复存在，“生活使所有的道德化为乌有”（让·弗朗索瓦·利奥塔 引言），道德需要依靠个人自律来实现。由此，道德的自由选择成为绝对私人化事件，但相伴而生的是道德模糊性的出现，人类随之陷入了道德危机之中，“对我们而言，道德选择（……）在本质上不可避免地是摇摆不定的（矛盾的）”（Bauman 21-22）¹。伦理规范的不确定性带来了道德的模糊性，人们的选择陷入了两难的困境之中。行为后果的难以预料可能会使良好企图变成灾难和痛苦。对人类行为与后果间的矛盾“可能已经阻碍了我们本应拥有的道德能力生长。它也使我们从以往继承下来的，被教导去遵守的，尽管很少，但是经过检验的，值得信赖的伦理规则变得软弱无力”（Bauman 16）。因此，后现代社会被描述为“风险社会”。

此种后现代伦理危机同样困扰着涉世未深的儿童，自由选择使儿童深陷道德模糊性带来的伦理困境，他们在利己与利他中难以做出选择。文学伦理学批评为儿童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帮助人们重新审视儿童文学如何向儿童读者阐释这一伦理困境，以及如何帮助儿童树立确定的伦理观念，“文学批评要回归历史的伦理现场，采用历史的相对主义的视角来审视不同时代伦理环境下人物做出的伦理选择”（聂珍钊 王松林 19）。“回归历史的伦理现场是区别于道德批评的关键一环，伦理的角度是批评的突破口，客观分析伦理原因是批评的过程，历史的道德评价是批评的目的和对文学教诲功能的彰显”（杨革新 119）。儿童文学开始吸纳后现代主义元素，向儿童读者解释他们所面临的时代困境，帮助儿童读者构建明确的道德价值观念。21 世纪的儿童文学提出了更多的存在主义问题，如梅格·罗索夫（Meg Rosoff）的《我是什么》（*What I Was*, 2007）关注到青少年的性别认知问题，斯蒂芬妮·迈耶的《暮光之城》系列探讨了死亡是否会终结的难题，大卫·阿尔蒙德（David Almond）的《怪物克雷》（*Clay*, 2005）则质疑上帝之死后善恶是否还存在等，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的《别让我走》（*Never Let Me Go*, 2005）等作品尽

1 本文外文引文均出自笔者译。

管并非以儿童的成长经历作为故事叙事主线，但故事意在向儿童读者展现真实的世界，帮助儿童思考当下的时代之问，“我是谁”、“人的本性是善还是恶”、“我将成为什么人”等问题。在当代英美儿童文学作品中，儿童形象被赋予了恢复世界秩序希望的同时，也被置身于更加复杂、多元的生存以及伦理环境之中。儿童主人公们同样面临着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之间的力量消长¹。儿童如何面对道德模糊性的伦理困境，究竟应该利用能动性选择利己的生活方式还是做出利他的伦理选择，则成为他们在选择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善恶标准的模糊性是这一伦理困境的重要特征，善恶不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关系。正如德勒兹就后现代主义语境中的伦理问题所作的阐释“伦理学对好坏的决定让位于道德判断，伦理学上的好变成了道德上的恶，而坏则变成了道德意义上的善，善-恶却非等同于好-坏，相反，它们（善-恶）相对于（伦理学意义）好坏是交换的、倒置的、逆转的”（Deleuze 121-122），善恶是两个相对的概念。例如，在维罗尼卡·罗斯（Veronica Roth）的《分歧者》（*Divergent*, 2011-2013）系列中，青少年女主人公翠丝在好友被药物血清控制的情况下，不得不伤害他人生命。杀戮在此并非一件极为邪恶的事情，而是自卫。但自此，翠丝陷入了自我谴责之中。

对当前利益与社会长远福祉的难以把控也是儿童陷入两难伦理困境的突出特征。缺少成人权威引导的青少年主人公们，需要依靠自己对事物的认知做出判断。例如，《哈利·波特》系列中的主人公哈利，最终在是否保留老魔杖的问题上做出选择。哈利最终毁坏老魔杖，将其抛下深渊。这一选择符合人类福祉的长远发展，规避权力至上的极权统治的可能性。

二、承担道德责任的伦理选择

后现代伦理理论的核心概念是道德责任，“责任”这一概念源于康德的现代伦理学，与外部强加的义务论相对立。²对后现代主义伦理来说，道德先于或超越了存在。后现代伦理的道德责任建基于他者伦理之上，强调关心他人，即对他人有道德的态度或持有道德上的关心，向他人表示爱和关心，给他人带来安慰等。³于此，道德不是对某种社会既定规则的遵守或屈服于外部强加的规范，而是来自于人的内在。为他者而存在是自我建构的行为，认识到不是“我是我”而是“我是为了”（Bauman 76）。自我在自我利益的缺失中出现，在对他人的关注中出现：“觉醒到为他人而存在就是自我的觉醒，这是自我的诞生”（Bauman 77）。相反，“失去道德的机会也就失去了与他者

1 参见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1): 383-398.

2 参见 Immanuel Kant, *Groundwork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Mary Gregor, introduction by Christine M. Korsgaar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xii-xiii.

3 参见 Zygmunt Bauman, *Postmodern Ethics*, Oxford: Blackwell, 1993, 76.

结合的自我的机会”（Bauman 77）。对他人的责任就需要个体自我进行伦理选择，包括为他人着想，尊重他人的自主权，不以任何方式干涉他人的自由，也就意味着要求个体思索在利己与利他之间如何做出选择，实现自我完善。

文学与道德紧密关联，儿童文学在呈现儿童成长的过程中，让儿童通过与外在世界的接触与学习，实现以利他主义为根基的伦理选择。相较于西方伦理学，文学伦理学批评将文学看作是道德的产物，“认为文学是特定历史阶段伦理观念和道德生活的独特表达形式，文学在本质上是伦理的艺术”（Nie, “A Basic Theory” 14）。“每一个人都需要通过自我选择完成人生的伦理选择。我们的行为、思想、情感、道德等，都是自我选择的结果”（聂珍钊 王松林 9）。文学“通过艺术形象提供更为典型的道德事实，并通过文学中的艺术世界提供研究不同种族、民族、阶级、个人和时代的行为类型的范例”（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 98）。“无论心理还是精神，情感还是道德，都是选择的结果。心理变化和精神状态也都是在选择过程中产生的”（聂珍钊 王松林 10）。菲利普·普尔曼的《黑暗物质》三部曲中，女主人公莱拉以孤儿的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在乔丹学院长大的莱拉得到院长的庇护，每日的生活充满快乐，还未认识到所处世界中教会极权的恐怖。莱拉最初的天真状态与教会极权世界之间形成一股张力，为莱拉的探索性成长提供可能。在之后的故事发展中，莱拉的困境在于如何在亲缘与真相之间做出选择，在选择过程中莱拉如何去实现利他的伦理选择。

个体在做出伦理选择的过程中往往会面临诸多道德误导，需要个体在实践过程中学会辨析错误的伦理规范，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教会最初以库尔特夫人的形象出现在莱拉面前，其伪善的外表极具迷惑性，获得了莱拉的信任：“库尔特夫人的魅力已经让莱拉迷上了她，很难把目光从她身上移开”（Philip, *The Golden Compass* 66）。因此，当莱拉得知库尔特夫人是自己的母亲，是切割孩子精灵计划的主谋时，才会更为震惊和痛苦。库尔特夫人向莱拉解释切割精灵是为了阻止尘埃，避免儿童的堕落：“你看，小时候，你的精灵是出色的朋友和伙伴，但是等你到了我们所说的青春期的时候（……）精灵就会带来各种令人烦恼的想法和情绪，这就会让尘埃乘虚而入”（Philip, *The Golden Compass* 283-284）。莱拉知道库尔特夫人的谎言，切割精灵只会使人痛苦地死去，这些被诱拐的孩子只是残忍实验的牺牲品。在这一过程中，莱拉认识到邪恶往往以伪善的面目出现，极具欺骗性，事物的本质并不如表面看来那么美好。莱拉弃恶扬善的同时还要在父母亲缘之间做出痛苦选择，最终莱拉选择支持父亲阿斯里尔勋爵对教会的反抗。

在伦理选择的过程中，莱拉认识到良好意愿与失败结局间的错位是个体错误的伦理选择结果。当阿斯里尔勋爵杀死莱拉的好友罗杰，得到通往另一个世界的能量时，莱拉又向经验状态迈进了一步，认识到成人权威不一定都是对的，“虽然我们看见他们做的都是坏事，是不对的，但我们还是相信了

他们的话〔……〕我们也认为尘埃一定是不好的东西，因为他们是大人，他们就是这么说的”（Philip, *The Golden Compass* 398）。莱拉还认识到意愿与结果之间往往是背离的，良好的意愿却带来不好的结局：“在罗杰这件事情上，我们完全弄错了，我们原以为是在帮他〔……〕”（Philip, *The Golden Compass* 398）。莱拉此时对善恶的认识更接近于德勒兹的内在性伦理观念，在德勒兹看来，善与恶是两个相对的概念，需要外在衡量标准的道德与以人类行动力量为准则的伦理观念背道而驰。正如埃马努埃莱·伯顿（Emanuelle Burton）所言成长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错误行动是达到目标的必然经历。¹错误的伦理选择使莱拉再一次获得成长，认识到善恶选择并非如表面看来那样简单。经过一系列的挫折与打击，莱拉走上了真正的经验之路，开启了寻找尘埃意义的探险之旅。

个体做出利他的伦理选择需要摆脱外在伦理规范强加于其身的行为束缚，自主选择人类福祉为其行为目标。《黑暗物质》三部曲中魔法神刀是一项科学研究成果，但魔法神刀的神奇力量在于可以穿透任何时空，使人在平行世界中任意穿行。这把神刀象征着无限的自由和力量，拥有自由意志，甚至可以将其意志强加于人，迫使人做出违背其自由意志的选择。喜鹊城的哲学家们制造神刀之初是出于利己目的，试图利用神刀自由的穿梭于其他世界之间，盗取其他世界的知识和技术。但在这一过程中，哲学家们付出了巨大代价，他们每切割一个窗口就制造出一个妖怪吸食成人的灵魂，使人变成一个麻木的躯壳。喜鹊城的孩子们因缺少成人引导往往表现出作恶的能力，认为猫不吉利便要杀死猫，之后喜鹊城的孩子甚至图谋杀死威尔和莱拉，夺得魔法神刀。这些可怖的后果都是天使之塔哲学家的错误选择造成的，他们关注的只是短期的、局部的、当下利益，忽视了长远的因果关系。不同于天使之塔哲学家们，年轻主人公莱拉和威尔借助魔法神刀做出了更具利他性的选择。小说中的莱拉和威尔之所以能够作出利他的伦理选择，与他们自我认定的伦理身份密切相关，他们平等地看待所有生命体，这一理念便促成了相应的伦理责任，即将整个世界的安危与和平视为己任。在小说最后，威尔和莱拉超越了个人私利，选择将窗口留给死人世界。他们分别回到属于自己的世界，完成建造天堂共和国的使命。

三、青少年的道德身份重构

社会共同体在某种意义上是人们共同遵守的道德契约，社会成员对共同制定的道德规范、伦理规则的遵守使得社会生活稳定，社会成员之间获得一种安全感。然而，后现代以来人们摒弃社会共同体，也就意味着撕毁道德契约。个体的行为没有统一的标准参照，松散的个体行为使得社会不再受道德

1 参见 Emanuelle Burton, "Moral Horror and Moral Maturity: Philip Pullman's Theological Anthropology for a Godless World," *Literature & Theology* 2 (2016): 198-214.

上的共识统治，在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中仅关注自我，仅按照个体意愿成长，打破了稳定安全的社会生活。在涂尔干看来，社会的生命要长于个体生命，个体拒绝支持或认可共同体的确定性、安全性，则会使其陷入孤寂。¹

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动荡，原有家庭模式与秩序被打乱，父母的权威地位动摇，青少年开始反思、质疑甚至拒绝接受成人的价值观念。儿童文学中的青少年主人公吸纳了后现代主义的抗争精神，被塑造为社会秩序的恢复者和重建者，而不再是被动接受成人权威的客体存在。儿童主人公们选择依靠自身行动改变周围世界，为他人谋求福利，选择修复道德契约，重建社会共同体。在构建社会秩序恢复者身份的过程中，儿童文学突出个体主动选择承担对所处共同体的责任。面对道德困境，他们选择“将道德从人为创设的伦理规范的坚硬盔甲中释放出来，意味着将道德重新个人化（……）道德之重新个人化意味着使伦理进程从终结线回归到出发点”（鲍曼，《共同体》39-40）。这个出发点为人们提供了个人和集体的认同感、责任感和义务感，似乎印证了歌德所称的“联系是永恒的”。

在《黑暗物质》三部曲中，普尔曼构建了三个“天堂共和国”模式，代表着不同的社会共同体形式，承载着儿童主人公们不同的身份选择。莱拉最初仅是成人话语的被动接受者，对教会和阿斯里尔勋爵的认识都建基于成人话语之上，莱拉在进行伦理选择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拒绝成人的话语规训，尝试构建起自己的天堂共和国，成为社会秩序的恢复者与重建者。在《黑暗物质》三部曲中有两个上帝形象：一个是隐于云山之上的权威者，另一个是创建天堂共和国的阿斯里尔勋爵。以权威者为代表的教会权威认为，符合教会意旨的行动就是善的，反之则为恶。阿斯里尔勋爵建立的天堂共和国遵从的并不是民主共和，而渐趋成为服从其主观意志的暴政。莱拉对于上帝和阿斯里尔勋爵的认识仅存于他人的话语之中。

莱拉对权威者的认识源自天使与周围反抗教会权威人士的言论，此时的莱拉缺乏自主选择意识，选择相信成人话语权威。天使向莱拉揭露了以权威者为核心构建的天堂共和国骗局，原罪是一个谎言，上帝是一个堕落的古代天使，他向人类编造了创世神话：

权威者、上帝、造物主、主、耶和华、艾尔、阿多乃、国王、圣父、万能的上帝——这些都是他给自己取的名字。他从来就不是造物主。他是像我们一样的天使——第一个天使，这倒是真的，最强大的天使，但他和我们一样是由尘埃构成的。（……）他告诉后来者是他创造了他们，但这是一个谎言。（Philip, *The Amber Spyglass* 31）

1 参见 齐格蒙·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285、287页。

莱拉对所处世界的认识,即“教会对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拥有绝对权力”(Philip, *The Golden Compass* 30),宗教为整个世界的运行和人类行为制定了一系列准则:“教会教导人们存在着两个世界,一个是由我们看得见、听得到、摸得着的一切事物组成的世界,另一个则是由天堂和地狱组成的精神世界”(Philip, *The Golden Compass* 30),都源于周围成人对宗教世界的评判,莱拉将这些评判内化为自身观点,憎恶教会。然而,莱拉所看到的权威者并不同于上帝,两者之间存在诸多差异。权威者不像上帝一样全知全能、不可见,而是一个被操控的、拥有身体的物质实体。权威者衰老、干瘪,正如库尔特夫人亲眼所见:“她想,那是个天使,老得难以形容(……)但是她感觉得到那可怕的衰老,一张深陷在皱纹中的脸、一双颤巍巍的手、一张发出咕啾声的嘴和满是黏液的眼睛”(Philip, *The Amber Spyglass* 396)。面对悬崖厉鬼的攻击,他无力反抗,只会孩子般的哭泣。莱拉和威尔甚至见证了他的死亡过程,那就是毫无痕迹地融化并消散。莱拉和威尔对权威者充满同情,认识到权威者只是宗教掌控者为维护自己目的和利益所型塑的一种观念符号。面对权威者被操控的现实,莱拉选择不再相信成人话语权威,她将自己的认知作为选择的出发点。尽管对权威者充满同情,但莱拉也更为坚定地摒弃了以极权统治为核心的天堂共和国的构建,选择推翻此种共同体形式。

莱拉最初选择认同阿斯里尔勋爵建立的天堂共和国的正义性,源自阿斯里尔勋爵支持者的正义话语之中,其反抗宗教权威的合理性与莱拉反抗极权统治的理念相吻合,莱拉尚未真正理解阿斯里尔勋爵建立的这一共同体本质。阿斯里尔勋爵的目标是征服而不是建设。在整个故事的发展进程中,他从未正面阐释过自己的理念。实际上,所有支持者都遭到阿斯里尔勋爵的欺骗,他们根据自己的理解阐释天堂共和国图景,奥滚威国王相信天堂共和国的正义性和民主性:“我们来这不是为了征服,而是为了建设”(Philip, *The Golden Compass* 210)。因此,他认为天堂共和国应该是“没有国王,没有主教,没有神父(……)。这个世界是不同的,我们要成为天堂共和国的自由公民”(Philip, *The Golden Compass* 210-211)。奥滚威国王阐释的是自己的天堂共和国理念并非阿斯里尔勋爵的设想,阿斯里尔勋爵其实质是以暴力征服一切,他虽然承认尘埃的存在,但他同样认为尘埃是一切罪恶的源头,不同于教会掩盖真相的手段,他直接采取暴力方式毁灭尘埃,期望获得征服死亡后的绝对自由:“我要把尘埃摧毁,到那时候,死亡就不复存在了”(Philip, *The Golden Compass* 377)。在认识到阿斯里尔勋爵建立的天堂共和国本质后,莱拉选择摒弃这一共同体构建模式,转而积极主动探索自己心中理想的天堂共和国形式,选择构建真正民主、自由的社会共同体,修复道德裂隙。

在认识到权威者和阿斯里尔勋爵所构建的天堂共和国的腐败与暴政特质后,莱拉不再盲目相信成人话语,认为人们不需要依赖外在标准做出选择,而

是应根据人类本性之爱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在小说最后，威尔和莱拉面对着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究竟是利用魔法神刀为自己留下一个约会的窗口，可以穿梭于两人的世界之间，实现他们的爱情？还是将这个窗口留给死人世界，使鬼魂可以回归自然，再次与世界成为一个整体？最终，威尔和莱拉克服了自私的本性，选择将窗口留给死人世界。这样的选择使得他们的爱可以永存，终将能够在死人世界相遇，以原子的形式永不分离。莱拉回到自己的世界重建天堂共和国，将以利他主义精神为主导的理念传递下去，恢复自己所在世界的社会秩序。普尔曼通过莱拉所建立的天堂共和国是一个更广泛的家，让莱拉重建以希望、利他和归属感为一体的共同体。因为对普尔曼来说，天堂共和国是对共同体的隐喻，当人类在行使他们所有的理性、意志、自由意志时，天堂共和国是一种“归属”，归属感使人们能够承担对他人的责任。普尔曼还将莱拉构建的天堂共和国与亲密关系、安全等联系在一起，因为它将构成人们真正的精神住所，使人“与宇宙相连”¹，让人懂得关爱他人，在与他人的关联中重新恢复共同体秩序。由此，青少年主人公们成为了伦理秩序的恢复者和重建者。

结语

在当代语境下，青少年经常不得不独立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甚至承担起重建秩序的责任。《黑暗物质》三部曲中年轻的主人公尽管身躯渺小，力量微弱，但是却能独自承受苦难、解决问题，最终做出了利他的伦理选择，并在型塑着更加美好的世界。“通过对一个个伦理选择活动的分析，存在于文学文本中的人物（……）能带领我们重新经历他们的伦理选择过程，感受他们经历过的喜怒哀乐和爱恨情仇，从他们的人生感悟得到启迪”（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与理论构建”78）。文学不应该逃避对未成年人进行真实世界的启蒙，更不应强迫他们接受某种所谓的社会价值观念，而是应该向他们解释现实，教会孩子如何判断是非，从而帮助和引导他们形成正向的伦理判断标准，作出理性的伦理选择，让未成年人学会在复杂多元的社会中生存和发展。按照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观点，文学的产生源于人类伦理表达的需要。儿童文学所传达出的伦理选择标准与经验，将会深刻地影响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读者。

Works Cited

- Bauman, Zygmunt. *Postmodern Ethics*. Hoboken: Wiley-Blackwell, 1998.
- Burton, Emanuelle. “Moral Horror and Moral Maturity: Philip Pullman’s Theological Anthropology for a Godless World.” *Literature & Theology* 2 (2016): 198-214.

1 参见 Philip Pullman, “The Republic of Heaven”, November/December 2001 issue of *The Horn Book Magazine*. <https://www.hbook.com/story/the-republic-of-heaven>. 3 Nov. 2001. Accessed 20 Oct. 2023.

Deleuze, Gilles. *Nietzsche and Philosophy*, translated by Hugh Tomlinson. Twin Cities: U of Minnesota P, 1983.

聂珍钊: “经典与阐释: 二十世纪欧美戏剧的文学伦理学批评”,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4 (2016): 5-7。

[Nie Zhenzhao. “Classics and Interpretation: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Dram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Journal of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4 (2016): 5-7.]

——.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1): 189-207.

——.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1): 383-398.

——: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聂珍钊、王松林主编: 《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研究》。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年。

[Nie Zhenzhao and Wang Songlin, eds. *A Study on the Theory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20.]

Pullman, Philip. *The Golden Compass*. New York: A Yearling Book, 2003.

——. *The Amber Spyglass*. New York: A Yearling Book, 2003.

齐格蒙·鲍曼: 《共同体》, 欧阳景根译。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Bauman, Zygmunt. *Community*, translated by Ouyang Jinggen.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2003.]

——: 《生活在碎片之中》, 郁建兴、周俊、周莹译。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2 年。

[——. *Life in Fragments*, translated by Yu Jianxing, Zhou Jun and Zhou Ying. Shanghai: Xuelin Press, 2002.]

——: 《流动的现代性》, 欧阳景根译。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2 年。

[——. *Liquid Modernity*, translated by Ouyang Jinggen.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2002.]

——: 《现代性与大屠杀》, 杨渝东、史建华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年。

[——. *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 translated by Yang Yudong and Shi Jianhua. Nanjing: Yilin Press, 2011.]

Bauman, Zygmunt. *Postmodern Ethics*. Oxford: Blackwell, 1993.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 《后现代道德》, 莫伟民等译。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0 年。

[Lyotard, Jean-Francois. *Postmodern Ethics*, translated by Mo Weimin et al. Shanghai: Xuelin Press, 2000.]

杨革新: “伦理批评的重新界定”,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 (2016): 117-121。

[Yang Gexin. “Redefining the Ethical Criticism.” *Journal of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4 (2016): 117-121.]